

工商资本下乡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邵俊杰¹ 周力^{1,2} 胡凌啸³

(1.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2. 同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2;
3.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工商资本下乡对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 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和浙大卡特一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数据, 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收入结构上, 工商资本下乡主要提高了农户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但降低了农业经营性收入;工商资本下乡通过推动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本地务农向本地非农就业转移, 提高非农就业率, 从而促进总收入增加;工商资本下乡的增收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的农户没有显著差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涉农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均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且增收作用逐渐增强。本研究为推进工商资本下乡、实现农民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工商资本下乡;农户收入;要素集聚;非农就业

中图分类号:F3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4)02-0123-12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纳入我国 2035 年发展总体目标。2021 年 8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 “促进共同富裕,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在“城乡中国”背景下, 如何有效提高农民收入, 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已有研究主要从农业补贴^[1]、农业技术进步^[2]、土地流转^[3]、数字经济^[4]、电子商务发展^[5]和返乡创业^[6]等方面分析了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 但对工商资本下乡增收效应的系统性实证研究较少。

提高农民收入, 当前的难题是农村缺少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发展要素^[7], 工商资本下乡在促进要素流动及优化要素配置上则可发挥重要作用。狭义上, 工商资本下乡是指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村, 进行土地整理、土地流转和新农村建设, 并从事农业经营^[8]。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工商资本下乡的定

收稿日期:2023-12-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收入稳定性监测与增收长效机制研究”(23&ZD116)

作者简介:邵俊杰(1993—), 男, 浙江杭州人,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周力(1981—), 男, 江苏连云港人,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胡凌啸(1990—), 男, 山东庆云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义被拓宽。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但到2023年,政策文件中的“城市工商资本”变成“社会资本”。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加强资本下乡引入、使用、退出的全过程监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这表明,工商资本下乡中的企业来源变得更加广泛,包括城市和本地工商资本。因此,本文将工商资本下乡界定为本地或外来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参与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农村资源开发等涉农产业或领域。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工商资本在农村流转土地,经营现代化农业,并逐渐从农业生产领域扩展到涉农二、三产业领域^[9],促进了各类要素的优化配置。无论何种工商资本,其逐利性是一致的,这导致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一直备受争议。

学界对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户发展关系的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且主要通过案例进行分析。部分学者对工商资本下乡带动农户发展持乐观态度。企业拥有农户所缺乏的资本、技术和市场能力,而农户拥有企业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力,工商资本在农业生产领域与农户缔结不同的契约安排,组织带动雇佣农户和承包农户经营^[10],实现互利共赢^[11],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制度^[12]。工商资本也通过促进土地等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流转,提高农户财产收益,促进其增收^{[13][14]}。然而,另一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资本下乡不仅无法带动农民增收,反而会损害农民利益。相关研究指出,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后,会利用其诸多优势支配农业生产,与农民争夺农业收益^[15],甚至挤出小农^[16],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计^[17]。安永军也以案例形式阐述,当工商资本利益与农户个体利益冲突时,工商资本并不会为农户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农户在面对强大资本时处于弱势地位^[18]。上述观点均是从农业经营视角论述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的影响。当前,工商资本下乡所形成的要素集聚通过劳动力池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农民就业呈现多元化方式,而鲜有研究关注工商资本下乡形成的要素集聚外部性对农户发展的影响。此外,限于数据可得性,少有的实证研究对工商资本下乡的度量相对粗略。高晓燕和任坤用全国的土地流转面积、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电力使用强度分别衡量工商资本下乡进行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特征和机械化特征^[19]。刘魏等、江光辉和胡浩则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1990年以来村庄农地被工商企业租赁的情况和企业提供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强度来衡量工商资本下乡^{[11][20]}。实际上,工商资本投资的范围包含了涉农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故需要对工商资本下乡有更全面的度量。

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和浙大卡特一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数据,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已有研究多基于案例分析资本下乡问题,少有的实证研究相对粗略地度量工商资本下乡,本文尝试通过CCAD数据识别出样本村范围内的涉农企业资本信息,构建村级层面的工商资本下乡变量,并实证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第二,本文系统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及收入结构的影响,并剖析不同产业和层级地区的工商资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厘清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影响的机制。

二、理论分析

经典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关注城市产业或企业集聚的外部性^{[21][22]}。Marshall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指出,企业集聚能够带来各种要素集聚的外部性经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池效应,二是中间投入的共享,三是知识溢出,即在特定地理空间上的共享、匹配和学习三大效应。工商资本下乡意味着多种农业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等)的集聚。工商资本下乡规模扩大,除了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农户增收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推动要素集聚形成的正外部性来影响农户发展。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在农业经营性收入上,工商资本下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有利于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但对农户土地的转出和非农就业的带动挤占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空间。具体而言,一方面,从事种养殖

业的工商资本下乡形成的集聚效应缩小了信息、知识和技术的传播距离,有助于实现知识溢出。该类工商资本下乡带来农业技术、服务等先进要素,促进农户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推动农户从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向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的经营模式转变,提高其农业经营性收入。但另一方面,从事种养殖业的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了土地要素的集中,转入农户土地,导致农户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要素减少,降低其农业经营性收入。同时,涉农一、二、三产业的工商资本下乡均会带来非农就业机会,促使家庭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领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非农就业是指从事农业劳动以外的所有工作,主要包括受雇于他人和自我雇佣两类。工商资本下乡促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的“挤占”,即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就业重心向非农就业转移,导致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减少,甚至可能出现弃耕抛荒现象,从而对农业收入产生负面影响^[23]。因此,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农业经营性收入的综合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正向作用与农户土地转出和非农就业带来的负向作用孰高孰低。

在工资性收入上,工商资本下乡对其有促进作用。工商资本下乡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促使农户采纳先进技术,从而形成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同时,工商资本下乡规模扩大不仅直接带来劳动力需求增加,还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劳动力需求,形成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为当地农民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本地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提高也助推了雇佣劳动力工资的上升^[24],从而促进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提高。笔者调查发现,2018—2020年,扬州市风车头村先后引进21家个体企业专业从事荷藕初加工,年初加工能力达到2.80万吨,销售收入可达1.20亿元,一共吸纳劳动力526人,新增农民工工资收入共3000多万元。因此,工商资本下乡有助于增加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

在非农经营性收入上,工商资本下乡为农户家庭非农经营创造了条件。工商资本下乡促使产业集聚,推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多样化,带动周边服务业、零售业和物流业等相关行业发展,为农村居民在非农领域创业带来更多机遇,进而提高农户家庭非农经营性收入。

在财产性收入上,工商资本下乡能够提高农户家庭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但其增收效果可能有限。理论上,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主要存在两个路径:一是,工商资本下乡促进土地要素的集中和经营规模化,企业通过流转土地直接增加农户家庭土地财产性收入;二是,工商资本下乡通过促进村集体经济这一途径,间接提高农户财产性收入。村集体经济组织一方面通过村集体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将连片土地租给企业,从中收取土地租金或者土地流转服务费^{[25][26]};另一方面利用集体所有的非农建设用地或村留用地,兴建加工厂房、仓储设施等,通过物业租赁经营等方式获得资产租赁收入^[27]。同时,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了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先进要素的集聚,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与企业联合发展,形成“村企统合”等村集体经济模式^[28],促进了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了村集体经济水平。根据《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能够凭借持有的股份参与集体经济分红,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红利。村集体经济越好,分红收益越多。综合来看,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提高主要来自土地财产性收入和村集体经济分红收入,但土地租金在短时间内相对稳定,村集体经济分红则极度依赖于村集体经济水平,分红收入平均到户后并不多。例如,江苏省宿迁市聚贤村与花木龙头企业江苏苏北花卉股份有限公司牵手合作,进行村企联合发展,2020年聚贤村实现收益分红25万元,户均分红仅345元。因此,工商资本下乡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可能有限。

在转移性收入上,工商资本下乡也能增加农户转移性收入的获取渠道,但其增收效果可能有限。工商资本下乡影响农户转移性收入的途径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工商资本下乡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当地财政税收,从而有更多的财政补贴资金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倾斜,惠及农民群众;第二,工商资本下乡也可能促使父代和子代收入提升,形成父代对子代的补贴或者子代对父代的赡养。然而,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大多较为间接,直接影响转移性收入的途径少,导致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可能有限。

综上所述,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提高农户工资性收入和非农经营性收入,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农业经营性收入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当前,农户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较高,从非农就业中获得的收入可能超过其农业收入损失。因此本文推断,工商资本下乡可以提高农户总收入。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农户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该项目在抽样上综合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位置以及农业发展情况,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随机抽取样本省;然后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等距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县、乡镇和村;最后根据村委会提供的花名册,随机抽取样本户。该项目于2020年8月和9月调查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共10个省中50个县(市)的156个乡镇,涉及300多个村的3800多个农户。该数据既包含本研究所需的农户生产生活、收入、劳动力就业情况等农户问卷内容(例如,收入问题调查的是2019年情况),还包含村庄特征、村集体经济等村庄问卷内容。本文使用的工商资本下乡数据来自浙大卡特一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该数据库爬取了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1949年以来登记在册的涉农企业注册信息,主要包括企业注册资本、经营状况和企业经纬度地址等信息。基于企业与样本村的经纬度信息,可将企业数据与样本村进行匹配。本研究中的涉农企业数据是指2019年处于经营状态的涉农企业,已剔除当年因退出经营而注销的涉农企业,共匹配到村3公里半径范围内在运营的涉农企业8501家,其中有注册资本信息的涉农企业5309家。在CCAD爬取数据过程中,个人独资企业和企业分支机构这两种类型企业的注册资本为缺失值,但整体上不影响结果,下文将采用在营企业数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另外,本研究不包含集体企业。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家庭人均收入。该变量采用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值表示。根据收入类型,将家庭人均纯收入细分为家庭人均的农业经营性收入、非农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由于细分的收入存在零值情况,故对其加1取对数。

2.关键解释变量:工商资本下乡。该变量用村3公里半径范围内涉农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对数值度量。虽然商事制度改革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但企业注册资本高低本身还是反映了企业主对规模的计划^[29]。企业注册资本及其缴纳情况是企业需要披露的重要信息,若企业未按期缴纳出资或对出资缴纳做出非正常安排,则会导致企业信用损失,理性交易者将会远离该类企业,最终使不诚信的企业无法在市场上立足^[30]。同时,工商管理机构亦会将此类非正常行为识别为经营异常行为,对其进行监控^[31]。此外,认缴制下可能出现企业天价注册资本和认缴期超长情况,但是股东需要在其认缴的金额内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认缴越多则责任越大。若公司破产,股东必须在其承诺的认缴注册资本范围内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因此,企业注册资本数据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适用于本文的分析。相比企业数量,企业注册资本总额更能反映工商资本下乡的规模情况,故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采用企业的注册资本数据,使用企业数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能够自主选择是否公示资产总额信息,这导致该指标数据存在大量缺失值,故本文未采用该指标。本文根据样本村庄总面积和村数量计算村平均面积。若将村庄范围视为一个圆,村平均半径约为2.04公里。由于所获取的调查村经纬度并不一定是在村中心,本文将村半径扩展到3公里,以尽可能识别村范围内的企业,并将2公里半径的识别范围用于稳健性检验。村3公里半径范围内涉农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也反映了资本的密度情况,体现了集聚的思想。

3.控制变量。借鉴余泉生等、张金林等的研究^{[32][33]},本文控制了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特征变

量。户主特征包括户主性别、年龄、教育和婚姻,家庭特征包括儿童占比、老人占比、家庭规模和党员,村庄特征包括地形、村书记经商经历和村人均土地面积。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家庭人均收入	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值(元)	9.3969	1.0422
农业经营性收入	农户家庭人均农业经营性收入对数值(元)	5.0988	4.0037
非农经营性收入	农户家庭人均非农经营性收入对数值(元)	1.2608	3.1911
工资性收入	农户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对数值(元)	5.5991	4.4078
财产性收入	农户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对数值(元)	2.0794	3.1166
转移性收入	农户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对数值(元)	5.6227	2.9915
工商资本下乡	村3公里半径范围内涉农企业注册资本总额对数值(万元)	7.2216	3.2992
性别	户主性别:男=1;女=0	0.9342	0.2480
年龄	户主年龄(岁)	56.0186	11.2364
教育	户主受教育程度(年)	7.8299	3.2094
婚姻	户主婚姻:已婚=1;其他=0	0.9175	0.2752
儿童占比	家庭14岁以下儿童占比(%)	11.0591	15.4387
老人占比	家庭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	17.6982	29.1922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人)	4.0601	1.5761
党员	家里有党员=1;否=0	0.3394	0.4736
地形	平原=1;否=0	0.4362	0.4960
村书记经商经历	村书记有经商经历=1;否=0	0.2557	0.4363
村人均土地面积	亩/人	12.6938	25.5661

(三)模型设定

为研究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W_i = \alpha_1 + \alpha_2 \text{Capital}_i + \alpha_3 X_i + \theta_j + \epsilon_i \quad (1)$$

式(1)中, W_i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户家庭*i*的收入水平; Capital_i 表示农户家庭*i*所属村的工商资本下乡规模; X_i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家庭和村等层面的变量; θ_j 表示县固定效应, ϵ_i 为随机扰动项。

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户收入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工商资本下乡规模扩大,可能促使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农户收入高的地方,经济活跃,也可能吸引更多的工商资本进入本地发展产业。同时,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作用也可能受到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工商资本下乡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既要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又要与扰动项不相关。工商资本下乡的滞后项与当期工商资本下乡相关,但与农户当期收入无关。此外,《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报告(2018)》指出,中国的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在3年左右。Hayward等发现,50%的企业寿命低于4年^[34]。4年周期能够使许多企业从兴起到退出,完成一个生命周期。因此,本文将滞后4年工商资本下乡指标作为工具变量。

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首先构建第一阶段回归模型:

$$\text{Capital}_i = \beta_1 + \beta_2 \text{IV}_i + \beta_3 X_i + \theta_j + \epsilon_i \quad (2)$$

接着将第一阶段中工商资本下乡的拟合值代入原模型,构建第二阶段回归模型:

$$W_i = \gamma_1 + \gamma_2 \text{Capital}_i^* + \gamma_3 X_i + \theta_j + \epsilon_i \quad (3)$$

式(2)中,IV为工具变量,表示滞后4年工商资本下乡规模; Capital_i^* 为第一阶段中工商资本下乡的拟合值。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2中的列(1)和列(2)报告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影响的OLS回归结果。列(1)未添加控

制变量,列(2)增加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工商资本下乡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工商资本下乡规模扩大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为处理内生性问题,表2列(3)和列(4)报告了2SLS的估计结果。未汇报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滞后4年工商资本下乡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F统计量拒绝了该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商资本下乡的估计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工商资本下乡能够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此外,本文也分别采用滞后1年、滞后2年、滞后3年的工商资本下乡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其估计结果均相似。限于篇幅,以下仅汇报采用滞后4年的工商资本下乡指标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考虑到内生性问题,下文回归均基于工具变量法进行。

表2 工商资本下乡对收入的影响

	OLS		2SLS(第二阶段)	
	(1)	(2)	(3)	(4)
工商资本下乡	0.0244 *** (0.0065)	0.0218 *** (0.0063)	0.0209 ** (0.0084)	0.0161 ** (0.0081)
性别		-0.0970 (0.0709)		-0.0983 (0.0702)
年龄		-0.0151 *** (0.0018)		-0.0152 *** (0.0018)
教育		0.0122 ** (0.0056)		0.0124 ** (0.0055)
婚姻		0.0982 (0.0629)		0.0968 (0.0624)
儿童占比		-0.0005 (0.0012)		-0.0005 (0.0012)
老人占比		-0.0035 *** (0.0007)		-0.0035 *** (0.0007)
家庭规模		-0.0841 *** (0.0128)		-0.0839 *** (0.0127)
党员		0.2432 *** (0.0356)		0.2436 *** (0.0353)
地形		-0.0994 (0.0615)		-0.0941 (0.0610)
村书记经商经历		0.0088 (0.0398)		0.0087 (0.0399)
村人均土地面积		-0.0012 (0.0008)		-0.0012 (0.0008)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3692	3628	3692	3628
R ² / Centered R ²	0.1482	0.2166	0.1482	0.2165

注: *、** 和 *** 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上述结果可能受到关键解释变量选择、被解释变量度量和估计方法等的影响,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关键解释变量。第一,采用企业数量衡量。国务院于2013年推出公司资本与登记制度改革五项措施,明令废除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资本缴纳改实缴制为认缴制。考虑到认缴制放松了注册资本登记条件,以及涉农企业数量也反映了工商资本在村内的规模,本文采用村3公里半径范围内涉农企业数量(所有在营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企业分支机构)的对数值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二,采用当年新增资本总额衡量。基准回归主要是基于注册资本总额的存量进行分析,缺乏对流量视角的考虑。这里采用2019年村3公里半径范围内新增的涉农企业注册资本总额对数值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三,缩小企业识别范围。若将村视作一个圆,村庄半径约为2公里,故本文将原3公里半径的识别范围缩小到2公里半径,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四,改变识别方式。针对狭义的资本下乡定义,考虑到CCAD的企业数据能够识别企业法人或者法人股东是否来自外县,本文采用有县外资本的涉农企业注册资本总额对数值度量县外资本下乡,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列(1)~(4)的结果显示,工商资本下乡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工商资本下乡能够提高农户收入,估计结果稳健。

2.替换被解释变量。为使估计结果可靠,本文还采用其他方法测度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参考杨修娜等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方法^[35],本文以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67%作为中等收入群体门槛,高于该门槛则被视为中等及以上收入群体,赋值为1,否则为0。表3列(5)的结果表明,工商资本下乡能够提高农户进入中等收入及以上群体的可能性。

3.采用聚类到村的稳健标准误。鉴于随机扰动项可能存在村内自相关,故通过计算聚类到村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进行稳健性检验。列(6)的结果也表明,估计结果稳健。

表3 稳健性检验

	替换关键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聚类到村的 稳健标准误
	企业数量	当年新增资本总额	缩小企业识别范围	改变识别方式	中等收入及以上	
	(1)	(2)	(3)	(4)	(5)	(6)
工商资本下乡	0.0468 ** (0.0235)	0.1025 * (0.0574)	0.0174 ** (0.0088)	0.0228 ** (0.0115)	0.0254 ** (0.0120)	0.0161 * (0.009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628	3628	3628	3628	3628	3628
Centered R ²	0.2172	0.0764	0.2155	0.2152		0.2165

注:列(5)采用Ivprobit估计,列(6)采用聚类到村的稳健标准误。

(三)机制分析

1.工商资本下乡对收入结构的影响分析。在研究总体收入的基础上,以下进一步剖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将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细分为人均农业经营性收入、人均非农经营性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和人均转移性收入,发现各类收入存在大量零值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部分农户家庭没有介入相应收入的行业或领域中。该情况会导致样本随机误差呈非正态分布,若采用OLS或2SLS模型则会产生估计偏误。本文利用两部分模型(Two-part models)对该类数据进行处理^[36]。两部分模型将农户不同类型收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户是否参与到某一类型收入的领域;第二阶段,在参与的前提下,决定收入水平。该方法将两阶段的决策看作是有先后顺序且相互独立的,从而避免样本选择误差问题。

表4列(1)~(5)分别汇报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各类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工商资本下乡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水平,但对农业经营性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在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方程中,工商资本下乡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工商资本下乡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有限。工商资本下乡产生的集聚效应,创造了诸多非农就业机会。工商资本下乡促使产业集聚,带动周边服务业、零售业和物流业等相关行业发展,为农户创业带来机遇,从而提高农户家庭非农经营性收入。此外,工商资本下乡为农户家庭成员从事雇佣劳动提供了机会,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时,工商资本下乡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形成对家庭农业劳动力的替代,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移,最终提高工资性收入。然而,工商资本下乡总体上降低了农业经营性收入,这是因为其对农业经营性收入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其正面影响。土地财产性收入占据了财产性收入的绝大部分,同时土地租金收入在短时间内相对稳定,难有较大变化,而且集体经济带来的分红收入也相对较低,使得工商资本下乡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不明显。类似地,工商资本下乡虽然能够增加农户转移性收入的获取渠道,但目前对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力度极为有限。

2.工商资本下乡影响收入结构的途径分析。工商资本下乡降低了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但能

	农业经营性收入	非农经营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1)	(2)	(3)	(4)	(5)
工商资本下乡	-0.0612*** (0.0151)	0.0738** (0.0333)	0.0276** (0.0110)	-0.0099 (0.0241)	0.0130 (0.01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752	3674	3757	3741	3425
R ²	0.2192	0.3559	0.2086	0.2877	0.3868

注:鉴于两部分模型没有工具变量法命令,本文将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拟合值代入两部分模型。限于篇幅,本部分仅展示两部分模型的第二部分结果。

够提高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本文进一步探析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工商资本下乡促进农户家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这一方面“挤占”了农业生产空间,从而降低农业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提高了非农就业率,从而促进工资性收入和非农经营性收入增长。本文选取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率衡量家庭非农就业情况,采用劳动力是否务农、是否本地非农就业和是否外地非农就业分析家庭劳动力就业类型(是为1,否为0)。其中,本地非农就业指在本乡镇以内的非农就业,外地非农就业则是指在本乡镇以外的非农就业。

表5列(1)针对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率的估计结果显示,工商资本下乡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工商资本下乡规模扩大有利于促进农户家庭非农就业率提高。工商资本下乡,一方面促进形成地方化的劳动力市场,从而直接促进农业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另一方面产生技术、服务等先进要素的溢出效应以及转入农户土地,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列(2)~(4)进一步分析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家庭劳动力就业类型的影响,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对劳动力本地务农有显著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同时对外地非农就业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了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本地务农向本地非农就业转移,进而导致农业经营性收入降低,但提高了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表 5 工商资本下乡影响收入结构的途径分析

	家庭非农就业率	本地务农	本地非农就业	外地非农就业
	(1)	(2)	(3)	(4)
工商资本下乡	0.0159*** (0.0030)	-0.0379*** (0.0068)	0.0244*** (0.0067)	-0.0071 (0.007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3588	15004	15004	15004
Centered R ²	0.2331			

注:列(1)采用农户家庭数据,列(2)~(4)采用农户家庭个体劳动力数据,利用Ivprobit模型进行回归。

(四)异质性分析

1. 农户禀赋异质性。虽然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积极影响,但是其产生的惠农作用也可能受到农户家庭禀赋的制约。在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禀赋的不同可能导致其资源获取能力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其从涉农企业发展中获得收益的大小。本文从家庭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视角,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异质性。将家庭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2年及以上的农户定义为高教育水平户,赋值为1,否则为0。将家庭曾是建档立卡户的农户设定为贫困户,赋值为1,否则为0。

表6列(1)汇报了家庭教育水平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工商资本下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工商资本下乡与高教育水平户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说明工商资本下乡规模扩大对高教育水平户和低教育水平户的增收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列(2)汇报了农户经济状况的异质性估计结果,工商资本下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工商资本下乡与贫困户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说明工商资本下乡对非贫困户和贫困

户的增收效应并无显著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虽然收入高、教育水平高的农户家庭凭借其资源获取能力容易从涉农企业发展中获益,但中国的工商资本下乡还具有帮扶农村弱势群体的重要功能,例如,江苏龙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坤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落户徐州王老家村,共吸纳 150 余名低收入村民就业。工商资本下乡带动农户就业增收的门槛不高,具有一定的普惠性,这使得农村弱势群体也能从企业发展中获益。

表 6 农户禀赋的异质性分析

	家庭人均收入	
	(1)	(2)
工商资本下乡	0.0138 *	0.0165 *
	(0.0082)	(0.0090)
工商资本下乡×高教育水平户	0.0377	
	(0.0314)	
工商资本下乡×贫困户		- 0.0120
		(0.0154)
控制变量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N	3628	3518
Centered R ²	0.2190	0.2181

注:已控制交互项的单独项。

2.工商资本产业异质性。不同涉农产业的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存在差异性,可能导致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20)》,依据涉农企业经营范围,划分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并在村层面分别加总得到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涉农企业注册资本总额。根据本研究数据测算,2019 年下乡的涉农企业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本占比分别为 57%、22%和 21%,其中第一产业的比例最高。

表 7 列(1)~(3)汇报了不同产业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商资本下乡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第一产业的估计系数最小。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关键资源是农村发展的短板,工商资本能为乡村发展带来各类先进要素。无论涉农企业从事何种产业,其形成的集聚效应均有利于促进乡村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第一产业的工商资本下乡,一方面,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提高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通过转入农户土地、先进要素替代农业劳动力或者利用农业优势地位挤压小农生存空间,形成促使农户家庭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推力”,以及通过雇佣农户提供非农就业机会(例如保洁等),形成非农就业的“拉力”。由于当前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较高,导致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入非农部门,而非农就业带来的收入足以弥补在农业生产上可能产生的损失,故总体上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当然,也有农户受雇于企业进行农业生产获取工资性收入,但该类农户比例较低。此外,涉农第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下乡带来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且其增收幅度要大于第一产业工商资本。因此,第一产业工商资本的增收效应要略弱于涉农第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

表 7 不同产业的异质性分析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	(2)	(3)
工商资本下乡	0.0167 **	0.0170 **	0.0171 **
	(0.0084)	(0.0085)	(0.00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3628	3628	3628
Centered R ²	0.2172	0.2156	0.2124

3.工商资本到不同层级地区异质性。工商资本下乡中“下乡”一词具有相对广泛的意思,“下乡”可下到不同的层级。上文研究仅分析了村庄层面的工商资本情况,但工商资本可能进入乡镇(不包含村)或者县城(不包含乡镇)。工商资本在不同层级地区发展壮大可能对农户收入产生异质性影响。为分析工商资本到村、乡镇和县城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进行回归,以便比较不同变量系数的大小。

表8列(1)和列(2)汇报了到各个层级地区的工商资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在村的工商资本规模扩大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在乡镇和县城的工商资本规模扩大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工商资本进村发展直接改变了农户的就业结构,增加对本村农民的雇佣,对农户收入产生直接影响,但工商资本在乡镇或县城发展产生的就业机会是面向乡镇或县城范围的劳动力,村庄农户没有优先就业的优势,导致其对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

表8 工商资本到达层级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家庭人均收入	
	(1)	(2)
工商资本到村	0.0826 *** (0.0277)	0.0477 * (0.0268)
工商资本到乡镇(非村)	-0.0156 (0.0803)	0.0090 (0.0775)
工商资本到县城(非乡镇)	-0.0013 (0.0284)	-0.0007 (0.0272)
控制变量	否	是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N	3680	3616
Centered R ²	0.0991	0.1793

注:表中采用县城的涉农企业资本总额衡量工商资本到县城,该变量与县固定效应存在共线性问题,故采用省固定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和浙大卡特一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数据,就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工商资本下乡规模扩大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其结果经过替换关键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更换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收入结构上,工商资本下乡主要提高了农户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降低了农业经营性收入。目前,农户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较高,从非农就业中获得的收入超过其农业收入损失,故农户收入总体是增加的。工商资本下乡主要通过提高农户家庭非农就业率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主要从本地务农转向本地非农就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工商资本下乡的增收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的农户均无显著差异,说明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弱势群体具有一定的帮扶作用。进一步细分工商资本产业后发现,涉农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均存在增收效应,相对而言,涉农第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增收效应更大。此外,工商资本到村才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到其他层级均无增收效应。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农村营商环境,推动工商资本下乡。政府有关部门既要综合运用随机抽查和信息公示等监管手段,又要支持落实税收优惠和优先申报专项资金等激励手段,优化农村法治环境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有序引导工商资本在村内发展。第二,加强对非农就业的农民进行技能培训,提高能力相对较弱群体的竞争力。在工商资本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当地政府应结合经济和产业发展需求,在生产制造和乡村旅游等领域对农民进行非农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其非农就业能力。第三,针对不同产业的工商资本,当地政府需分类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尤其需要重视推动链条长、农民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涉农第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发展。对以大规模土地流转等形式直接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工商资本,在鼓励资本下乡的同时需做好全过程监管,规范企业引入和退出程序,保障农民权益。对涉农第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需完

善各类乡村建设用地的指标政策,解决制约其发展的“用地难”问题。

参考文献:

- [1] 朱青,卢成.财政支农政策与农民收入的实证研究——基于农业补贴的视角[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67—83.
- [2] 廖开妍,杨锦秀,曾建霞.农业技术进步、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基于中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J].农村经济, 2020(4):60—67.
- [3] 冒佩华,徐骥.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J].管理世界, 2015(5): 63—74.
- [4] 李怡,柯杰升.三级数字鸿沟:农村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J].农业技术经济, 2021(8): 119—132.
- [5] 唐跃桓,杨其静,李秋芸,等.电子商务发展与农民增收——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 2020(6): 75—94.
- [6] 罗明忠,魏滨辉.返乡创业、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3(1):83—96.
- [7] 蒋和胜,张彦伟,刘胜林.构建稳固脱贫的长效机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0(5): 4—8.
- [8] 焦长权,周飞舟.“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J].中国社会科学, 2016(1): 100—116.
- [9] 杨人豪,杨庆媛.资本下乡、经营土地与农政变迁——以成都市郫都区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128—138.
- [10] 胡新艳,陈文晖,罗必良.资本下乡如何能够带动农户经营——基于江西省绿能模式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21(1): 69—81.
- [11] 刘魏,张应良,李国珍,等.工商资本下乡、要素配置与农业生产效率[J].农业技术经济, 2018(9): 4—19.
- [12] 熊万胜,石梅静.企业“带动”农户的可能与限度[J].开放时代, 2011(4): 85—101.
- [13] 田鹏.从种地到经营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研究——基于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2): 103—108.
- [14] 周力,沈坤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农户增收效应——来自“三权分置”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 2022(5): 141—157.
- [15] 贺雪峰.工商资本下乡的隐患分析[J].中国乡村发现, 2014(3): 125—131.
- [16] 涂圣伟.工商资本下乡的适宜领域及其困境摆脱[J].改革, 2014(9): 73—82.
- [17] 罗必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难点与方向[J].社会科学文摘, 2017(4): 53—55.
- [18] 安永军.政权“悬浮”、小农经营体系解体与资本下乡——兼论资本下乡对村庄治理的影响[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33—40.
- [19] 高晓燕,任坤.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J].江汉论坛, 2020(7): 31—38.
- [20] 江光辉,胡浩.工商资本下乡会导致农户农地利用“非粮化”吗?——来自 CLDS 的经验证据[J].财贸研究, 2021(3): 41—51.
- [21] 吴明琴,董志强.产业集聚如何影响员工薪酬:基于制造业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 2016(4): 89—101.
- [22] 苏丹妮,盛斌.产业集聚、集聚外部性与企业减排——来自中国的微观新证据[J].经济学(季刊), 2021(5): 1793—1816.
- [23] Guo, D., Jiang, K., Xu, C., et al. Industrial Clustering, 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22, 154: 105878.
- [24] 李江一,仇童伟,秦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非农就业带动效应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10—21.
- [25] 涂圣伟.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政策选择[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23—31.
- [26] 冯楚瑶,翁时秀.以实践为导向的旅游地返贫机制分析框架构建[J].地理研究, 2023(2): 312—331.
- [27] 郑世忠,谭前进,赵万里.辽东山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2): 285—294.
- [28] 王晓飞,岳晓文旭,周立.村企统合:经营村庄的新模式——以浙江省湖州市 L 村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 2021(10): 20—31.
- [29]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 2018(4): 1557—1580.

- [30] 郗伟明. 股东出资义务“常态加速到期理论”之反思——兼论对不诚信认缴出资行为的可行规制[J]. 法商研究, 2022(3): 85—98.
- [31] 施天涛.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 解读与辨析[J]. 清华法学, 2014(5): 128—141.
- [32] 余泉生, 周亚虹. 信贷约束强度与农户福祉损失——基于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3): 36—47.
- [33] 张金林, 董小凡, 李健.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 ——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J]. 财经研究, 2022(7): 4—17.
- [34] Hayward, M. L., Shepherd, D. A., Griffin, D. A Hubris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J]. 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2(2): 160—172.
- [35] 杨修娜, 万海远, 李实.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其特征[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10—22.
- [36] 张锦华, 刘进, 许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土地流转与农地滞留[J]. 管理世界, 2016(1): 99—109.

Doe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Flowing to Rural Areas Increase Rural Household Income?

SHAO Junjie¹ ZHOU Li^{1,2} HU Lingxiao³

(1.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3.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flowing to rural areas hold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 factors, thereby fostering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rural households.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he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RRS) in 2020 and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qiyuan China Agri-research Database (CCAD) to analyz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on the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This finding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In income structur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mainly increases non-farm operating income and wage earnings, but reduces agricultural incom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promotes the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from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o local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mproves th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rates, and thus increases total incom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rural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t shows the role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to help the rural vulnerable group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related to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ll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income,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is gradually enhanced. The findings furnish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infusion into rural areas, with the aim of fostering prosperity among rural households.

Key word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Flowing to Rural Areas; Rural Household Income; Element Agglomerati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责任编辑:易会文)